



[英] 阿奇·布朗 著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改变世界的七年

Archie Brown

世界知名学者权威解读苏联解体真相
戈尔巴乔夫上台与下台始末
权力的大堤怎么毁于蚁穴
改变世界的七年究竟改变了什么

新华出版社

世界知名学者权威解读**苏联解体**真相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改变世界的七年

【英】阿奇·布朗 著

韩凝 许宝友 张文成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变世界的七年：新版/（英）布朗著；韩凝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66-0165-5

I. ①改… II. ①布…②韩… III. ①苏联解体—研究 IV. ①D7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4391 号

京权图字：01-2009-6748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Copyright © 2007 by Archie Brow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由作者授予新华出版社

改变世界的七年

作 者：〔英〕阿奇·布朗

出 版 人：张百新

选题策划：刘 飞

责任编辑：贾晓伟

责任校对：刘保利

封面设计：肖 东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8.25

字 数：32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165-5

定 价：50.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导论	(3)
第二章 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	(23)
第三章 苏联改革的第一阶段，1985—1986 年	(51)
第四章 1987—1989 年，根本的政治变革	(77)
第五章 苏联政治体制改革	(103)
第六章 改革的起源与发展：制度双重性还是公民社会？	(121)
第七章 制度的瓦解与国家的解体	(143)
第八章 共产主义转型中的国际影响	(159)
第九章 结束冷战	(177)
第十章 透视戈尔巴乔夫及其时代	(201)
注 释	(235)
译后记	(278)

第一章

改变世界的七年



导论

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仅在 7 年的时间内，东欧会剧变，苏联会解体。然而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也不乏观察家迅速地站出来指出这一结果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的确，像这种在许多（虽然并不是全部）方面都效率低下的制度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但也必须看到它在 70 余年的时间里也经历了无数的风雨考验，并且保持强大的政治和军事防御能力。

关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解体的各种过于泛泛而谈甚至误导性的观点受到关注并广为流传。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制度已经变得奄奄一息，行将瓦解；与此大相径庭的另一种观点则论述到，苏联制度的转型、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主要是由里根政府一手促成的；同样荒谬的看法是，叶利钦对摧毁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制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有另一种颇有市场但却荒谬的看法是，叶利钦的统治是改革的继续，只不过是采取了更加民主的形式。本书的各个部分，尤其是最后一章将对这些简单化或错误的观点详加论述和批驳。^①

和平变革难以在一个固化而高度威权的制度中产生和发展。在民主国家中政府的某些失误很容易导致政权的更替，但是在威权主义的统治下，特别是在像苏联这样成熟的制度下，同样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不同于东欧的大部分政权——本质上是外国强加的——苏联的制度深深扎根于俄国的土壤之中。直到苏联改革前夕，领导者们还能老练地使用手中的“红萝卜”和“大棒”，迫使未曾壮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萎缩成为几个微不足道和边缘化的团体。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苏联已经濒临崩溃，无论其最高领导层内部发生什么，它都必将走向衰亡，这完全是异想天开。

政治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尤其是高度威权主义的体制，也不会永远一成不变。然而，尽管它们在政治上存在很多问题，经济上效率低下，但这并不妨碍它们采取各种手段来进行自我维护，以存在更长时间。苏联政权可以通过控制教育系统和大众媒体来操纵舆论，以及动用其他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清除有

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被选定为这个国家新的领导人，这个决定完全是由核心领导层——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后一机构迅速批准了前者的决定。对于普通的苏联公民而言，这种事情就像天气一样不受他们的控制。^②

虽然领导层没有感受到来自下层要求改革的明显压力，但是对政治精英当中更富有远见和思想性的一些人来说，存在着刺激变革的重要因素。苏联与西方国家（甚至事实上与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80年代上半期苏联的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下滑状态。虽然这一切并不是1985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而且以往的苏联领导层总是把注意力转向别处却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重振国家雄风和解决存在的严重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最初做出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

戈尔巴乔夫知道，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仍感到非常遗憾，^③所以他经常表示：除了改革，别无选择——苏联当时处于一种“危机前”的状态，甚至处于“严重危机”之中。^④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他也指出，他本来可以维持现存的制度，不使其发生根本改变，但这在道德和政治上无法接受。^⑤这两种说法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苏联或俄罗斯肯定不可能在没经实质性改革的制度下长期繁荣兴旺下去。然而，轻微的改革外加强有力的管控，也能够使苏联的制度和这个国家都得以维持到21世纪。1989年3月戈尔巴乔夫完成了一部著作，后来因其已落后于他自己的思想和政治发展的步伐而决定不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戈尔巴乔夫不仅指出了进行改革是唯一的选择，而且更加精确地论述到：“改革是必需的，因为没有其他可以替代改革的合理的、建设性的选择”。^⑥

根本性的改革逐渐摧毁了苏联政权的支柱。改革引发危机与危机催生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⑦正如科特金所说：“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并且政权稳定。国家外债水平很低，信用评级优良。改革开始之前，国家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国内动乱，并且即使在那个时候苏联也保持了规模不断缩小但依然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内务部和克格勃机构，并且它们都忠于国家。”^⑧同样，阿伦也写到：

“1985年，苏联拥有同10年前大体相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长期存在的物品短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实际上，情况曾经比此时糟糕得多……无论如何，在大众的贫困与政策的变化之间即使有联系也是很脆弱的，往往不是导

致自由化的改革，而是导致更加严厉的镇压。此外，苏联几乎不可能在外部的压力下崩溃。相反，1985年苏联正处于其世界权力和影响力的巅峰时期，其根基在于在战略核力量上与美国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⑨

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某个时候，这一制度确实面临过全面危机。但是，由此导致的制度变化完全不同于改革。制度变化本来不需要朝着使国家更加自由或者更加民主的方向前进。在苏联精英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国家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也存在着改革主义和更加自由的追求。在苏联的党群机关中，前者的人数比后者多得多，更不要说在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中。鉴于苏联的多民族特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上台极有可能导致流血冲突，会产生一个比掌权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政权更具强制性的领导者。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是一个“停滞的时代”——正如在改革期间的称呼一样，而且是以新斯大林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发展趋势为一方，以改革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为另一方的僵持时期。改革对于代表后者的势力来说是一个胜利，但是这一结果并非事先注定的。

改革前的苏联制度

要想了解改革给苏联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就必须简要回顾一下这个国家改革之前的状况。在此之前，苏共垄断了权力，对此人所共知的委婉说法是“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其他政党遭到禁止，而且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的独立团体也不允许存在。党内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也是国家最权威的决策机关。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仅是党的领导人，也是这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

共产党被列宁及其继任者视为“先锋队”式的政党。这也就是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倾向于把党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存在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同时，又使其能够相对于其他社会团体吸收更多的成员参与其中。在苏联，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不超过（也不打算超过）成年人口的10%。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员人数占总人口的6.5%左右，也就是每10个成年人中有一位党员。在绝对数量上，截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夕，共产党有不到700万名党员，到了1990年，党员的数量增加到了近2000万人；随后又呈现出下降趋势，到1991年夏，党员人数下降到了约1500万人，此时的党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

按照苏联共产党的章程，五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是苏联共产党最具权威性的会议。在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之间，党由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它的内部机构——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来管理。^⑩中央全会一年只开几次，每次仅一两天，而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为常设机构则在数星期内就召开一次会议。当苏联公民谈论中央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时，他们未必是天真或不谙内情的。一般来说，他们提到的不是全会上“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他们实际上是指派的），而是指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里的官僚机构。中央委员会下辖约 20 个部门，大量日常的方针政策都由这些部门制定和落实。不过这个制度等级极为森严，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比那些没有这一头衔的部门负责人的权力要大得多。其中最具权威地位的是资深书记——那些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人，他们拥有广泛的权责。苏斯洛夫就是这样一位苏共党内大佬，一位既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又分管外交政策的保守共产党员。从 1955 年至 1982 年 1 月去世他一直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⑪

尽管共产党的领导人——总书记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最高地位，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制度存在着双重行政问题。有部委系统，也有党的组织机构——实际上，政府各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是一个超级大部）的数量要比中央委员会下属的部门数量多出许多。部长会议主席是该制度中的领导人物，他又与党的机构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部长会议主席都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的各个部门是政府各部委的上级监管者。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党的部门及其相应的部委共同做出的决定有时采取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联名签署的形式对外发布。

按照传统，部长会议主席负责除农业之外所有经济领域的管理工作，因为农业属于总书记的管辖范围。总书记主要负责对外政策并对每一个其他领域的政治活动进行总监督，即便是在经济问题上，如果总书记与部长会议主席之间发生分歧，前者最终也会占上风。因此，柯西金——在 1964 年 10 月勃列日涅夫被选为党的领导人的同时，他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所支持的 1965 年温和的经济改革，才会于 1968 年结束。勃列日涅夫对终止这场改革负有主要责任。他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避免引起那些认为改革会损害自身利益的党的干部们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忧心忡忡的理论家们的回应，他们认为柯西金具有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会引发类似“布拉格之春”的政治影响。不过直到 1980 年去世前不久，柯西金

一直保持着自己作为部委首脑的地位，并始终是政治局的资深委员之一。

柯西金的继任者吉洪诺夫是勃列日涅夫的老相识和铁杆盟友。他确立了足够权威的地位，这使他在政治意义上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寿命都比他的上级领导更长。吉洪诺夫从1980年开始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直到1985年才被戈尔巴乔夫免职。虽然政治局曾经是苏联国家中最高决策机构，但实际上——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它对中央委员会各部门，或国家各个部委，特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常常是毫无异议地点头通过。^⑧1988年9月8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发表评论说，^⑨在改革之前，无论中央委员会的机构提出什么，政治局一直都是例行公事式地予以批准。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很多人对戈尔巴乔夫所说情况的真实性有直接的了解。有趣的是，戈尔巴乔夫将这一说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包括政府部委系统在内的决定。在一次涉及党和各部委官僚机构的谈话中，他说：“一般来说，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比它级别更低的机构开始算起，无论这些部门向我们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在政治局、在书记处，甚至在中央全会上，都例行公事式地加以批准。”他特别提到政府各部委，指出，如果有人试图对部长会议提交给政治局的建议做出任何改动，这个人“就被吉洪诺夫同志置于永久、永世的仇敌阵营之中”。^⑩

总书记是政治局中的核心人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中，吉洪诺夫可以依靠这位党的最高领导人做后盾。政治局所提出的任何新的重要倡议也都必须获得其他机构的支持才能贯彻实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使他面临着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但是1990年3月创设的执掌行政权的国家总统职位，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将他从政治局强加的限制中解脱了出来。

在未经改革的苏联制度中——在改革时期也一样，虽然程度上不同——另一股主要势力就是强力机关，特别是克格勃。在后斯大林时代，克格勃隶属于党的最高领导层，并且在1982年最初的几个月安德罗波夫接替苏斯洛夫担任了苏共第二书记（同年11月他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但是，对党的领导人来说，克格勃主席可能会成为危险的敌人。1964年和1991年都出现过克格勃主席转向反对总书记，并试图罢免总书记的事情（1964年是谢米恰斯内反对赫鲁晓夫，1991年则是克留奇科夫背叛戈尔巴乔夫）。尽管在这两次事件中，克格勃主席都不是单独采取行动，而是与党和政府的其他高级领导合作。

军工综合体是政治力量平衡中不能忽视的砝码。它在苏联改革前的时期享有特权地位：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支出而不是发展经济，而且对军事的保密及偏执意味着军工企业很少生产民用产品。苏联军人和相关的利益集团都会满怀眷恋地回忆勃列日涅夫时期，^⑩尽管当时奉行的许多政策，诸如1968年8月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等，带来了更为长久的灾难。

按照1977年苏联宪法，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实际上，这个机构——国家名义上的立法机构——拥有的权力大大小于本章中已经讨论过的那些机构。它在宪法上的优越地位是一种法律拟制。在改革前的苏联，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完全被行政机关架空。^⑪最高苏维埃每年的会期只有几天时间，无论摆在它面前的是什么法律都只能一致通过。虽然担任最高苏维埃代表是一种荣誉，但该职位也仅限于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门中挑选干部出任。在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每个选区只有一个候选人，并经常以近乎全票的票数当选。严格地说，最高苏维埃是一个橡皮图章式的、毫无独立主见的立法机构。奇怪的是，地方苏维埃虽然没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或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那么高的威望，但在许多方面却是比联邦立法机关更为严肃认真的政治机构。因为这些苏维埃不仅承担了地方政府的职责，而且还肩负了某些特殊使命。商店、理发店和洗衣店甚至都是国有的，因此它们也被列入了苏维埃的管辖范围内。应当补充的一点是，在改革之前，地方苏维埃代表是通过非竞争性、单一候选人的选举方式产生的。像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一样，这些选举也是被操纵的。^⑫

需要三重（或四重）的转变

如果苏联制度要实现多元化和充分的民主化（这些目标逐渐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议程的核心内容），需要的不是一重的转变而是多重的转变。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与民主体制不兼容。但这一推论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一定会孕育出民主制度。一直以来，市场经济与右翼威权主义政权共存的例子并不鲜见。虽然存在为数众多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民主国家，但却不存在一个把计划经济与民主政权结合起来的国家案例。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需要同时进行变革，这一点使得苏联的转型尤为因

难。与此前十多年领导西班牙和葡萄牙威权主义统治转型的人相比，苏联改革者面临的形势要严峻许多。当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改变独裁政体并没有相应地要求彻底改变经济制度。右翼独裁政权的转型，并不需要从国有制和国家指令型的经济体制向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虽然在改革过程中苏联领导层中的一部人（包括戈尔巴乔夫）逐渐认识到商品价格应该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而不是由国家价格委员会来确定），但是如何走向市场化的问题却从未得到恰当地解决。例如，能否在渐进的改革中实现这一目标，是否需要“大跃进”式的改革，取消垄断是否应当优先于价格自由化等问题，仍然众说纷纭，充满争议。在苏联解体前夕，叶利钦是通过把支持市场经济（尽管他避免涉及“资本主义”一词）与抨击现存的不平等现象和强调社会公正结合起来而赢得声望的。言下之意是，走向市场将带来更多的平等机会。对叶利钦的支持——甚至在坚定的民主积极分子当中也是如此，大多都依赖于他所假定的平等主义。^⑧

迄今为止，对在苏联最后几年里标榜是“民主派”的信仰体系做出最为认真研究的人是卢金，他说明了为什么市场化与民主化之间注定会存在紧张的对立状态。特别是依照俄罗斯民主派人士对后一概念所作的具体解释更是如此。正如卢金所观察的那样：

“将民主（以及作为其必要组成部分的法制）理解为推行公正的手段是俄罗斯‘民主派’的显著特征。按照这一论点，把‘公正’和‘法制’的概念凌驾于‘民主’的概念之上，是更为根本的。这种理解包含了如果民主没有导致公正而对民主本身大失所望的可能性。并不让人惊讶的是，当叶利钦的‘民主派’领导集团掌权之后，许多社会公正和法制的支持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新领导人的政策并没有消除特权和实现公正，他们离‘民主’集团而去，一些人实际上变得对民主极度失望。”^⑨

戈尔巴乔夫比叶利钦看得更清楚的是，无论市场化的改革多么具有必要性，它都有可能引发比苏联改革前的经济制度更大的不平等。此外，数百万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将变得更差。戈尔巴乔夫自己是朝着民主社会主义方向推进改革的，但是从未形成过关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识。在这一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在不同时期因受到相互矛盾的建议的影响而显得举棋不定，并且由于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的阻挠，他未能成功地制定出一种持续性的经济转型战略。^⑩

无论如何，苏联经济转型的道路都是充满险阻的。正如诺夫在改革开始仅两年就注意到的那样：

“有必要强调从中央计划向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转型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即使这种转型已经以持续性的和大家公认的形式存在，即使有关各方都竭尽全力实施所渴望的变革，情况也将如此……各个阶层的苏联公民已经学会了如何忍受原有的制度以及如何在这一制度中生活……激进改革的最重大障碍之一是：这是一个各阶层都非常保守的社会。”^⑧

雅科夫列夫对诺夫最后一句话中谈到的问题表现出了认同，在改革已经成为历史之后，他很到位地描述道：“在努力改造这个国家的过程中，我们（这里我把自己包括在内）首先大大低估了社会的心理状况。后来的结果证明，社会大众的惰性、冷淡和依赖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⑨

由于需要在其他密切相关的领域也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也就是所说的第三重转变），这增加了对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的难度。这个领域就是多民族构成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与联邦行政体系之间的关系。改革之前，苏联实质上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却具有联邦的形式。15个加盟共和国当中除了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属于部分例外，每一个共和国——无论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克兰，还是乌兹别克斯坦——都有“自己的”共和国党组织（以及中央委员会和共和国第一书记）、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和科学院。俄罗斯之所以例外，是因为它占了苏联人口的一半和苏联版图的四分之三。因此，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党组织（或科学院，虽然它有自己的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因为如果有的话，那将意味着与全联盟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有太多的重复。可能也一直有一种担心，即拥有自己的第一书记的俄罗斯中央委员会可能成为一种与全联盟范围的中央委员会分庭抗礼的力量。^⑩

然而，最根本的一点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共产党高度中央集权的性质意味着存在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管理严密的组织，它覆盖并且控制了“国家的”部门机构，构成另一个等级化的权力体系。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联邦形式除了对民族意识是一种安慰以外，相对而言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在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条件下，联邦形式却具有重要意义，并获得了实质性的内容。改革期间这一领域所发生的一切不仅展现了民族情绪所产生的动员力量（在苏联案例中，这是一种谋求独立的力量），而且体现了制度安排（联邦形

式)潜在的重要性。要知道,苏联的这种制度安排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被大多数国内和国外观察家们视作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表面文章而已。^④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是,苏联有一百多个不同的民族,其中在加盟共和国一级之下的许多民族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领土单位,例如,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巴什基尔和鞑靼“自治共和国”。虽然苏联最终分裂为15个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刚好与15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土边界一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民族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因为一些没有达到独立建国目的的民族认为联盟的破裂对它们来说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了。^⑤

可以认为,如果苏联要成功地实现制度的转型,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三重转变”而是四重的根本改变。第四个挑战就是结束前面已经提到的苏联经济的过度军事化。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军事工业集团的规模使得军方和军事工业在这个制度中处于压倒一切的特权地位。但这并未让他们获得自主权,因为党和军方领导的相互交替是十分广泛的。^⑥党的领导层拥有最后决定权,军方在党的领导层中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方在党的最高层中主要代表的党内地位。在1976年至1984的8年中,乌斯季诺夫既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正式成员,军方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当然是保守的意见。在讨论勃列日涅夫时期军方的政治态度问题时,科尔顿恰如其分地评论道:

“对于苏联社会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士兵们坚决主张维持现状。可以预料,军队领导人反对扩大少数民族自主权、优先投资消费经济、对知识分子做出让步和对外部世界更加开放。至于民主理论的关注核心——政治形式和程序,苏联官员除了对他们自己接近国家领导人的机会感兴趣外,几乎对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得漠不关心。”^⑦

在改革期间,军工部门的地位并未被完全动摇。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不仅是源于冷战自身存在的危险,而且是作为试图改变国内政治优先次序的序幕。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包括减轻军方在决策过程中的权重和降低军费开支在预算中的份额。^⑧

戈尔巴乔夫和与那些认为有必要让军队更好地为对外政策目标服务和剥夺军事工业集团在苏联经济中的特权地位的人,都在尽其所能地采取一切手段同制度的惯性作斗争。1987年5月西德青年鲁斯特从天而降抵达莫斯科。他不仅驾驶自己的轻型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数百英里,而且就在红场附近降落,这给戈尔巴乔

夫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就在鲁斯特抵达的第二天，5月30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利用这个机会严厉斥责了最高层的军事领导人，替换了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元帅和防空军总司令科尔杜诺夫元帅。在回应对这次苏联防空出现的不光彩事件的批评时（尽管这一事件让苏联社会各界和外部世界感到可笑），科尔杜诺夫元帅承认，他是在飞机降落在莫斯科之后才得知关于这架飞机情况的。戈尔巴乔夫讥讽地问他，他的消息来源是不是莫斯科的交通警察。^⑧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很多批评，这些批评得到了谢瓦尔德纳泽的大力支持。在戈尔巴乔夫批评结束之后，自始至终一直在场的索科洛夫元帅说：“如果这是政治局的一致意见，那么对我来说只有离开国防部长的岗位了。”^⑨实际上，他别无选择。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并一致表决同意任命亚佐夫为新的国防部长，这是事先已经商议好的决定。

尽管四年多以后亚佐夫参加了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未遂政变，但最初对他的任命也确实削弱了军方对戈尔巴乔夫主导的、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积极支持的新外交政策的反对。多勃雷宁出席了接受索科洛夫辞职的政治局会议——并且注意到在索科洛夫辞职与亚佐夫得到任命之间，时间间隔只有15分钟。他写到，戈尔巴乔夫“充分利用了军方的混乱状态以及军方声誉受到的严重损害”。^⑩多勃雷宁补充说：

“亚佐夫对戈尔巴乔夫要比索科洛夫顺从得多，因此戈尔巴乔夫完成了静悄悄的政变。新国防部长不大了解裁军会谈的情况，与裁军会谈没有什么关系。有了亚佐夫做国防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谈过程中感到自在得多。军方的反对变得更加温和。继索科洛夫之后有大约100名将军和上校退役，他们同样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他对美国人做出让步的保守的军事领导人。但军方领导机构仍然对戈尔巴乔夫不满，这一点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⑪

断言戈尔巴乔夫“优柔寡断”成了改革年代后期的一种老生常谈。退一步讲，这种说法也是过于简单化了。有很多时候他的所作所为既勇敢大胆又坚决果断，这件事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什么是改革？

正如我在前言中已提到的那样，并且这也是以后各章会反复谈到的一个论

点，即改革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含义。但是，它不应当作为 1985 年 3 月至 1991 年 12 月在苏联所发生的一切的同义词来使用。它是特指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少部分人，在一小部分政治精英的支持下，最初只是改革苏联的制度，但后来却导致了这一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型。改革伊始，共产党内的最高层围绕着改革速度和方向就存在着激烈争论。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这种意见不合越发明显。甚至在这场改革的发起人和坚定支持者的内心中（至关重要，包括了戈尔巴乔夫）也存在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虽然他们希望推动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程，但他们并不想让局面失控。然而，一旦改革开启，经年岁月所压抑的问题被公开讨论和披露，那么按部就班进行渐进式的改革设想就显得过于理想化了。

从字面意义上而言，改革（perestroika）意味着重建（reconstruction）或重构（restructuring）。如果把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话，前一种意义更可取，因为它带有在同一块土地上建设新的大厦的含意，也带有另一种更有限的含意，即只是对现有建筑进行适度更新。对苏联领导层中赞同戈尔巴乔夫所提倡改革的大部分人来说，改革的含义从来没有超出过后者。然而，对戈尔巴乔夫和发起这一政治工程的很多核心盟友，包括雅科夫列夫来说，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改革就是更具根本性质的变革。改革还具有道德层面的含义。^⑧俄罗斯学者富尔曼最近将其称之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新教”。^⑨沙赫纳扎罗夫，一位重要的改革者、曾经是戈尔巴乔夫麾下颇具影响的助手，早在多年前就将苏联改革与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做过类比（他提到过，他是有意使用宗教改革这个概念）并让人们联想到了路德的名字。^⑩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困境在于，在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经典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世俗宗教中，他既是教皇又是路德——这一困境甚至在改革期间就有人谈论过。^⑪

变革的动力来自上层而不是来自下层群众，从许多方面看这一事实是一种不利条件，因为改革只有非常有限的时间来争取民众，夯实基础。邦纳援引她已故丈夫萨哈罗夫的话说：“我们不是从地基而是从屋顶开始建造我们的新房子。”^⑫萨哈罗夫的言下之意是，这远不是着手建立新的政治结构的理想方式。然而它却是改革能够在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苏联里得以发生的唯一途径。在当时的苏联，既没有产生自下而上群众式的改革运动的丝毫可能性，也没有（更不用说）发生革命的些许可能。当局把所有未经许可的政治抗议活动都视作是对国家生存的一种威胁。尽管这表现出了当局对于其政权合法性和公众支持率的信心不足，但却